

国图藏《天游山人集》残本价值辩证

解 扬

内容摘要:本文以明儒杨应诏《天游山人集》在国家图书馆藏四卷残本、日本内阁文库藏二十卷足本与该书被选入《明儒学案》的文字对勘。认为国图藏《天游山人集》虽为残本,但收录文字更为严谨精炼,刊刻亦精;二十卷足本的目录却与收文并不全然吻合,卷中各篇文末也有行文粗疏之弊,因此残本所存更胜于足本中的相应文字。用《明儒学案》与两者互校,可知黄宗羲所用为如今国图藏残本原书,辅以《学案》对杨应诏思想的判断,更旁证了《天游山人集》残本原书更胜于内阁文库足本。据此,本文认为对于存世文献的残本与足本,在使用上当有辩证的眼光。选用文献,不能凭借其残篇或全帙就遽断优劣,而应该根据研究对象,合理判断选用。

关键词:《天游山人集》 《明儒学案》 残本 足本

古籍的残本,因为内容不及足本,在研究中往往被视为次选。除了专门以版本校勘为目的,研究者选用古籍,一般不会穷尽其所有存世版本,在细致比较其同异,定出优劣之后,再择其善者而用之。更多的情形是取其便易,径用足本;当足本不存时,才用残本。此举的合理性是基于这样的共识:“凡不完整的书称为残本。残本的价值当然不如足本,但是在足本难求的情况下,残本也非常可贵。”^①

但中文古籍浩如烟海,从成书、刊刻到流传,间或散佚,每个环节都不乏复杂性和多样性,令残本在保存信息的丰富程度上有胜过足本的可能。于是,如果将上述共识放大为足本必定胜过残本而不加比较轻取足本用于研究,则可能会忽略残本中的重要信息,甚至当同一文献形成不同的刊刻系统时,会出现对系统中的文献出处难解的疑惑。

^①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版本编》,齐鲁书社,1991年,第280页。

要说明在共识之外特出的情形,以检讨在选用文献上可能存在的疏漏,非深入剖析个案,不能说明道理。本文选取明刻本杨应诏《天游山人集》为例,先分析它的残本和足本,比较其同异,据以判定两者的价值;再用《明儒学案》中选录的《杨天游集》与两本对比,用黄宗羲的判断作为校勘现存这两个存世版本优劣的辅助论据;最后,从古籍所属的系统同异角度,对残本和足本在研究中的选用问题,提出一些具有普遍性的意见。

一、《天游山人集》的足本与残本

《天游山人集》原书20卷,共6册,足本现藏日本内阁文库,其影印本为台北汉学研究中心收藏;另有四卷残本,含第10-13卷,现藏国家图书馆,被《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收入第110册。为行文方便,下文将此书的这两个版本分别以足本A、残本B标示。

由于残本B的目录不存,我们无法从整体上对比两本的收文情况,只能以两书都见收录的卷10-13进行比较。在足本A中,目录显示卷11有《与罗念庵书》,但该卷内并无此文;在卷13的首篇却是《与罗念庵书》,目录中也有相应记录。这一条信息让我们初步判定,足本A的目录和卷内的篇目并不完全吻合。

足本A卷12、13的目录与卷中文字虽然匹配,但与残本B卷12的收文对照,可见两本该卷的收文有一致性,但目录却并不完全相同。目录显示,足本A卷12的第4篇《与邹东廓先生书》、第5篇《与章介庵辨朱陆书》与残本B卷12这两篇的顺序颠倒,但两本该卷中这两篇文字的顺序却一致,是为足本A目录误植又一例。由此可见,残本B和足本A的正文有一致性,A的目录很可能是在正文编辑完成后添加的,因此出现了与正文不一致的顺序错误。

在卷中收录的文字上,两本也有不同。在卷12中,残本B比足本A多出了三篇文字,即该卷第6篇《答马钟阳侍御书》、第7篇《与唐荆川论文书》和第8篇《与王稚川太常书》。第13卷中,残本B比足本A多出了四篇文字,分别是第4篇《与罗近溪书》、第5篇《与傅锦泉书》、第6篇《与何古林书》和第7篇《与林梅墩书》。要辨析这七篇文字差别引起的版本价值优劣,就需要对两个版本进行仔细校读。

以两本卷12均收录的《与章介庵辨朱陆书》为例,两本版式相同,但仔细比较文字,可以发现以下四类差异:第一,残本B中,间有一字或两字的空格,可以参照足本A补齐。例如“尊德性非上乘,道问学非粗迹,而尊德性到熟处,不可谓德性,【此心】中非学问贯通之境;道问学到熟处,不可谓问学,【此

心】中非德性浑含之天”^①句中，方括号中的“此心”便是可用足本A补齐的文字。第二，在足本A中表述重复的文字，残本B中无，例如“窃以为象山之道高于一己”句中的“窃”，在足本A中为“余尝窃”^②，残本B即是删繁就简的结果。同类者另如：“学之不力，实之不务，而徒譊譊焉于□□晦庵、象山同异之议，何哉！”^③残本B中的这两个空格，在足本A中是“朱陆”二字，因为显然与晦庵、象山重复，因此不存，以空格表示。第三，篇末的文句，残本B比足本A简略。B中末句“惟明公毋靳其说，幸终教之可也”，在A中为“惟明公毋靳其说，亦幸有以教仆可也。临纸不尽，但有驰情”^④。很显然，与足本A相比，残本B的表达更为精炼准确。第四，从行文的语气和用词的对仗来看，残本B比足本A严谨，例如足本A中“以言语求朱陆而不以人求朱陆，率天下于朱陆见解不同无据之迂谈，而不根究于朱陆身心有用之实学”^⑤句中，B无“无据”二字。从文中“不同之迂谈”和“有用之实学”的对仗来看，去此二字，B比A更工整。第五，残本B的表述比足本A更准确，例如A本此篇中“道公于天下，非晦庵所独得私而有也，亦非象山所独得私而有也”句，B即无此二“独”字，显然是谓道可为朱熹、陆九渊所得，但并非二人所独得，故而较A为优。

从上文对比可见，在收文上，残本B比足本A丰富。在行文和表述上，A中在文意和语句上重复的内容，有的在B中不存，以空格表示；有的B本径删；A中行文有欠工整之处，B也以删略处理，表现了整体上清晰整齐的行文风格。

这是两本在文字上的简单对比所得，要论其文献学意义，则需要借用第三者参校，看它们在文字殊异之外，用于研究上是否存在不同的价值。下文即用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引用的《杨天游集》与两本对勘，将黄氏取舍的理据，置于《学案》呈现的面貌和杨应诏思想的特色这两个维度中定位，以判定两本在思想史和文献学上的价值。

二、《明儒学案·杨天游集》的出处问题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不仅在勾勒明代学术脉络、整理学派地域传衍和记录学者观点学说上有重要的思想史价值，在保存明儒的著述上也有不可替代的文献学意义。它不仅为当代学者提供了明儒著述的线索，保存了部分如今已然不存的明清刻本中的文字，更展现了黄宗羲取舍明儒著作的用意以及删

①杨应诏：《天游山人集》卷十二，《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10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786页。

②④杨应诏：《天游山人集》卷十二，第788页。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刻本，第19页。

③⑤杨应诏：《天游山人集》卷十二，第787页。

改上的思考^①。

《明儒学案·杨天游集》在分析《天游山人集》残本B和足本A上的价值在于：参校三者，不仅可以判定黄宗羲选录杨应诏著述时工作的底本，藉此了解他对A和B价值的判断，更可以清晰地呈现两本自身的优劣所在。为方便分析，下文以“学案C”指代《明儒学案》选录的杨应诏文章。

学案C从杨应诏文集中共选录了文字9条，用残本B和足本A与之参校，可知其出处如下表：

《明儒学案·杨天游集》(学案C)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收《天游山人集》(残本B)	内阁文库藏《天游山人集》(足本A)	篇名
1	卷12,第3条	卷12,第3条	B题《答人论学书》A题《答许南华书》
2	卷12,第3条	卷12,第3条	《答许南华书》
3	卷12,第4条	卷12,第5条	《与章介庵辨朱陆书》
4	卷12,第5条	卷12,第4条	《与邹东廓先生书》
5	卷12,第5条	卷12,第4条	《与邹东廓先生书》
6	卷13,第3条	卷13,第3条	《与陈明水书》
7	卷13,第3条	卷13,第3条	《与陈明水书》
8	卷13,第4条	无	《与罗近溪书》
9	卷13,第6条	无	《与何古林书》

学案C收录的杨应诏文字，在残本B中均能找到出处，在足本A中却有两处不见记载。这两条便出自上文提到的残本B卷13收录而足本A无的第4、6两篇文字。由这两条差异，便可判断：黄宗羲编纂《明儒学案》中的《举人杨天游先生应诏》学案，选用的工作本有可能是残本B。

为坐实这一判断，还必须以两本文字上的至少一个细节为例，证明黄宗羲摘录杨应诏文集，是以残本B或他当时可见此书完璧时的面貌为工作底本，而非依据足本A选录。由于《明儒学案》成书，并非逐字照抄编书时所用的明儒文集，选录的过程中经过黄氏删改^②，因此我们必须选择为学案C收录，并在残本B和足本A中都有，且可见两本差异的句子，才能说明问题。

黄宗羲摘录《天游山人集》的9条文字，篇幅都不长，多数不涉及上文分

^①相关的最新研究，包括朱鸿林：《〈明儒学案·崇仁学案〉校读》，《明史研究论丛》第1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97-208页。何威萱：《〈明儒学案〉的文本剪裁及编纂问题析说：以魏校学案为例》，《明史研究》，黄山书社，2015年，第187-208页。

^②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和例证分析，参看朱鸿林《〈明儒学案·姚江学案〉的文本问题》，《国学研究》第34卷，2014年，第305-361页。

析的残本B和足本A的四种文字差别,唯有第5条例外。下面先看这第5条的文字——为了表现文本差异,下文用方括号表示《天游山人集》原文,圆括号表示《明儒学案》所做的删改:

今之学者,【其弊实坐此。】不能实意以积义【有事】为事,(乃)【而乃】欲悬空去做一个勿忘勿助;不能实意致中和,戒惧乎不睹不闻,(乃)【而乃】欲悬空去看一个【喜怒哀乐】(未发气象)……^①

这句中五处方括号里的文字,残本B和足本A完全一致,但在加着重号的“去看”二字中间,足本A有“欲”字;残本B和学案C相同,并无此字^②。也即,在此处学案C与残本B同,与足本A有异。由此可以断定,黄宗羲编纂杨应诏学案时使用的工作本,当是残本B或者是其全本无疑。

学案C的价值,不止于判断黄宗羲阅读杨应诏文集时所用的版本,它还能用来分析黄氏研究杨应诏学术倾向时,依据足本A,而非残本B,会产生何种思想史上的影响。要说明这一问题,便要分析杨应诏学案中的第8、9两条文字,它们不见载于足本A,而仅能从残本B中选录。其中,杨应诏学案的第8条是澄清为学入门所当下手之处的问题,黄宗羲选录的这段话,首句便是“今世学者,病于不能学颜子之学,而先欲学曾点之狂,自其入门下手处便差”。接下来是反例,列举当时学者的病处,如“不解克己复礼,便欲天下归仁;不解事亲从兄,便欲手舞足蹈;不解造端夫妇,便欲说鸢飞鱼跃;不解衣锦尚絅,便欲无声无臭;不解下学上达,便自谓知我者其天”。举例之后,强调为学入手处的根本是“日用平实伦纪处”,要经历“动心忍性苦楚”^③。在黄宗羲眼中,这段话由于其核心思想与黄氏为杨应诏做的小传中强调的学术重点恰相吻合,故对展现杨应诏的学术面貌,必不可少。黄宗羲说:“先生之学,以寡欲正心为主本,不愧天为归的,一切清虚玄远之言,皆所不喜。”^④但黄宗羲此处拈出的这一核心要点,在摘引的杨氏文字的前七条中,并不能得到充分体现,故而这第8条有收录的必要。

细看黄宗羲摘录的杨应诏文字,第1条是讨论圣人无欲的问题,说“圣人之所以能全其本体者,不过能无欲耳”。第2条是讨论尽事物道理的态度问题,即要在“恭”、“敬”和“忠”三者上做工夫。第3条是强调朱、陆二人的立身表率作用,后学者不应局限于学其言语。第4条是谈收放心问题,认为不可“过用其心而不觉”。第5条是批评当时学者不踏实追求孔颜之学,而去外面

①黄宗羲:《举人杨天游先生应诏》,《明儒学案》卷八《河东学案》下,中华书局,2008年,第156页。

②杨应诏:《与邹东廓先生书》,《天游山人集》卷十二,《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12册,第789页。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刻本,第20页。

③④黄宗羲:《举人杨天游先生应诏》,第157、155页。

讨求“滋味快乐来受用”的问题。在这条里,杨应诏涉及了学者入手不从孔颜之学而追慕悬空的问题,但仍然没表现出黄宗羲所着意的寡欲正心的核心问题。第6条虽然谈心,却是以圣人之心和工夫论对看的逻辑铺陈,并未从正面提出对心之本体的理解。但杨应诏已经清晰地表述了他的工夫论:“工夫有积累之渐,本体无积累之渐,工夫有纯驳偏全不同,本体无偏全,无纯驳也。”第7条借与王畿对话谈“悟”。这一条在学案中的排列逻辑,看似在4、5、6和8条之间跳跃突兀,但意在强调为学的真种子也要“透得声色货利”两者,也是论工夫之言^①。

黄宗羲选取的这第1至7条文字层层递进,侧重工夫论,关照了杨应诏对学者该如何入手做实在工夫的问题,既讲说了道理,也批评了现状,却并未就杨氏所强调的日用平实伦纪处根求和动心忍性苦楚中着力这两点做深入论析。但这两者却是在黄宗羲眼中杨应诏为学的根本所在。因此,若无第8条文字入选学案,黄氏的根本判断,便没有了落脚的依据。

再看这第8条文字的出处《与罗近溪书》全文,正是从工夫论角度阐说何者是为学入手处的关键。杨应诏先说“孔门一段事业所教诏真学脉在颜渊,所许与真天机在曾点,有颜子克己功夫,则自有曾点与物偕春胸趣,否则不免为狂也”^②。接着论证狂者非孔门正路,惟有颜子是“吾人所当下手处”,即是曾点之乐,亦是颜子箪瓢陋巷之乐扩充所得^③。接下来,便是黄宗羲摘引的一段文字。之后,杨应诏点出北宋尹焞和明代的吴与弼、王艮等人,认为皆是“朴实路上人”,“虽其所学所造诣未深且大,然此亦是近来一种近里学问”。杨氏因为坚守颜子为学之道,着意于克己工夫不辍,故而反感学者讲学不下真苦学力便求真乐的路数是偷懒求便,尤其是这种风气已然成为海内学者通病,“恐将来寝成个虚狂套括而其弊不止于清谈之祸而已”^④。杨氏这一言论虽是端正学者入门的工夫论,但在黄宗羲看来,正匹配他对杨应诏的评价:“然其言多自夸大,而雌黄过甚,亦非有道气象。”^⑤这一点在杨应诏学案的前7条文字中也无从表现,因此选录该条文字,也是能证明黄氏基本判断的必需之言。

第9条文字是接着上条,在讲说了为学的入门下手处和日用功夫之后,论述禅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黄宗羲引述的这段话出自《与何古林书》,原文先谈学术界惑于禅学的整体面貌:“今日海内学者惑于释氏学殊甚,而达摩、慧能知悟喙聒,充满东南,所在哗然。”然后,杨氏专论陈白沙“亦溺于禅学”的观点,以其“物有尽而我无尽,静中须养个端倪出来”之言“不知何所指”,论其

^①黄宗羲:《举人杨天游先生应诏》,第155-157页。

^{②③④}杨应诏:《与罗近溪书》,《天游山人集》卷十三,第799-801页。

^⑤黄宗羲:《举人杨天游先生应诏》,第155页。

根本是“援儒而入于佛”。^①这是文中批评儒者溺于佛学的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从历史的维度纵向展开,杨应诏说:“此学千有馀年来,一坏于宋之张子韶;子韶之后,由杨慈湖决裂尤甚。程门虽游、杨、谢诸公,皆不免焉。是何异端之能感人如此!”^②接着,杨氏以陈白沙“年来虽演莲华教,只与无言是一般”的诗句与“释氏虚无之说”一致,认为白沙之学溺于佛学,其程度实在严重,其影响更不容忽视。因为“阳明倡良知之说,东南学者酣入骨髓,人人自以为知行合一,人人自以为内外两忘,人人自以为易简,人人自以为当下便得,人人自以为圣脉真传”,究其实则是“白沙有以起之”。杨氏的批评逻辑是“白沙且然,又况夫他”^③!这是以陈白沙姑且不能免除来自佛学的负面影响,论证他所见的儒学溺于禅学情形之严重。在这样的局面下,学者定然有种种不能自拔的表现,其具体所见,就是黄宗羲引入学案的第9条文字:“静坐者,或流於禅定;操存者,或误于调息;主敬者,或妄以为惺惺;格物穷理者,或自溺于圆觉;存心养性者,或陷于即心见性。”^④最后,杨应诏说正因为对这种局面心存担忧,因此编著了《卫道录》,最后给当时巡按福建的何松柏(1510-1588,号古林)致函,希望他能坚持儒学正途^⑤。

从这篇给何松柏书信的铺陈逻辑看,虽然是向何松柏提出改善儒学现状的期望,但根本目的是在批评儒学溺于佛学的现状之后,点出其工夫论根源。从理路上,是接续学案中此前的8条文字。黄宗羲引入这第9条文字的目的,就是在前述引入的文字之后,指出将工夫论落实于儒者修行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究其思路,无疑是从理论到现实的评判角度转换使然。

试想,如果缺少《天游山人集》的残本B与学案校勘,而径用足本A检视黄宗羲的选录,则读者不仅会形成黄氏所录无据,更可能对黄氏的选录形成轻率而有失条理的错觉。但以学案C这一旁证,对《天游山人集》的残本B和足本A进行互校,就恰好说明了黄宗羲选录杨应诏的著作,不仅有本可循,而且在呈现其思想上,突出了杨氏侧重工夫论的特点;选用文字也是理论和批评结合,显现出次第推进的层次性。我们能作出这一判断,就因为杨应诏的文集残本和足本并存,残本B提供的信息,让我们能全面把握杨应诏的思想,为我们充分理解黄宗羲的判断提供了依据。

三、结语

古籍目录的编纂以精炼、准确为必备要素,研究者不必、也不可能苛求编者详述经眼的所有古籍,替研究者把好选用文献的所有关卡。以上文剖析个案为基础,本文试就古籍残本和足本的价值判定和选用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①②③⑤}杨应诏:《与何古林书》,《天游山人集》卷十三,第803-804页。

^④黄宗羲:《举人杨天游先生应诏》,第157页。

首先,要剔除卷数形成的迷惑,不能仅凭存世古籍的篇幅卷次,就判定足本和残本在内容上的优劣。实际的情形,可能是存世古籍卷数多的本子就是原刻足本,但也可能其祖本远逊于存世残本的祖本,故而在特定卷次中保存的文献,足本不如残本相应的部分丰富。

于是,引发了研究者需要注意的第二个问题,即要确定残本和足本是否属于同一个刊刻系统。《天游山人集》的存世残本和足本,明显属于不同的刊刻系统。况且,由于残本的目录不存,我们无法断定它的原貌就一定是与足本相同的二十卷。至少从卷内篇目对比来看,该书的残本收文要比足本相应卷次的范围广。因此,在目录可供比较的情形下,初步判断古籍存世的本子是否属于同一系统,进而决定是否需要进行比较书中内容,是研究中选用古籍的必要环节。

第三,至于对古籍的残本和足本做全面比勘的必要性问题,就需要根据研究的目的而定。本文是有针对性地以《明儒学案》为旁证,从黄宗羲对杨应诏思想的判断,反观他对杨应诏文集的取舍,进而论定《天游山人集》存世残本和足本的价值,因此必须校勘源自杨应诏著述的A、B、C三份文献。但是,如果研究的目的是杨应诏所处的时代问题,或他个人对明代思想界、社会上所流行议题的回应,则必然要充分利用足本A,甚至将之与残本B结合起来研究,以保证所用文献的全面、丰富。

也即,我们在选用古籍的存世残本和足本时,不能根据书目提供的卷数或书前目录的信息就轻率判断,而应该从研究目的出发,充分考虑存世古籍在流传过程中可能形成的各种复杂性,尤其是刊刻系统和祖本的同异问题,慎重选择古籍开展研究。如此,则即使研究的目的不是版本校勘,也能落笔有据,持论公允,不致挂一漏万,形成硬伤。

【作者简介】解扬,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明史。